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中国农业遗产研究丛书

● 王思明 刘馨秋 主编

中国传统村落：  
记忆、传承与发展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中国农业遗产研究丛书

● 王思明 刘馨秋 主编

中国传统村落：  
记忆、传承与发展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村落: 记忆、传承与发展研究 / 王思明, 刘馨秋主编.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116-3259-3

I. ①中… II. ①王… ②刘… III. ①村落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8409 号

责任编辑 朱 绯  
责任校对 贾海霞

出 版 者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2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010) 82106626 (编辑室) (010) 82109702 (发行部)  
(010) 82109709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82106626  
网 址 <http://www.castp.cn>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 230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836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98.00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中心 阶段成果

##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编委会

---

总 编：王思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王红谊 | 卢 勇 | 包 平 | 朱 绯 |
| 刘 旭 | 衣保中 | 严火其 | 李 明 |
| 李 群 | 沈志忠 | 陈少华 | 夏如兵 |
| 曹幸穗 | 盛邦跃 | 惠富平 | 曾京京 |

---

##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丛书》编委会

---

总 编：王思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王红谊 | 卢 勇 | 包 平 | 刘 旭 | 衣保中 |
| 严火其 | 李 明 | 李 群 | 沈志忠 | 陈少华 |
| 夏如兵 | 曹幸穗 | 盛邦跃 | 惠富平 | 曾京京 |

---

## 关于《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

---

中国有上万年农业发展的历史，但对农业历史进行有组织的整理和研究时间却不长，大致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金陵大学建立农业图书研究部，启动中国古代农业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程。同年，中国农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万国鼎（1897—1963）先生从金陵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发表了第一篇农史学术论文《中国蚕业史》。1924年，万国鼎先生就任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亲自主持《先农集成》等农业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1932年，金陵大学改农业图书研究部为金陵大学农经系农业历史组，农史工作从单纯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向科学普及和人才培养拓展，万国鼎先生亲自主讲“中国农业史”和“中国田制史”等课程，农业历史的研究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农业部批准建立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学院双重领导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先生被任命为主任。在万先生的带领下，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的研究工作发展迅速，硕果累累，成为国内公认、享誉国际的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中心。2001年，南京农业大学在对相关学科力量进一步整合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继了自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创建以来的学术资源和学术传统，这就是研究院将1920年作为院庆起点的重要原因。

80余年风雨征程，80春秋耕耘不辍，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在几代学人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发展成为一个特色鲜明、实力雄厚的以农业历史文化为优势的文科研究机构。研究院目前拥有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专门史、社会学、经济法学、旅游管理等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除此之外，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还编辑出版国家核心期刊、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会刊《中国农史》；创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先后投入300多万元开展中国农业遗产数字化的研究工作，建成了“中国农业遗产信息平台”和“中华农业文明网”；承担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农史研究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畜牧兽医史专业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的；形成了农业历史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信息收集和传播展示“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万国鼎先生毕生倡导和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在进一步发扬光大。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有着整理和编辑学术著作的优良传统。早在金陵大学时期，农业历史研究组就搜集和整理了《先农集成》456册。1956—1959年，在万国鼎先生的组织领导下，遗产室派专人分赴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100多个文史单位，收集了1 500多万字的资料，整理成《中国农史资料续编》157册，共计4 000多万字。20世纪60年代初，又组织人力，从全国各有关单位收藏的8 000多部地方志中摘抄了3 6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分辑成《地方志综合资料》《地方志分类资料》及《地方志物产》共689册。在这些宝贵资料的基础上，遗产室陆续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麦、粮食作物、棉、麻、豆类、油料作物、柑橘等八大专辑，《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农史研究集刊》等，

撰写了《中国农学史》等重要学术著作，为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受到国内外农史学人的广泛赞誉。

为了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加强农史专门人才的培养，2005年85周年院庆之际，研究院启动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文库》推出的第一本书即《万国鼎文集》，以缅怀中国农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万国鼎先生的丰功伟绩。《文库》主要以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科学研究工作为依托，以学术专著为主，也包括部分经过整理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资料。《文库》启动初期，主要著述将集中在三个方面，形成三个系列，即《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丛书》和《中国作物史研究丛书》。这也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研究院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向。我们希望研究院同仁的工作对前辈的工作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希望他们更多地关注经济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就历史而谈历史，就技术而言技术。万国鼎先生就倡导我们，做学术研究时要将“学理之研究、现实之调查、历史之探讨”结合起来。研究农业历史，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内部，要关注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经济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为今天中国农业与农村的健康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王思明

2007年11月18日

##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丛书》序

---

农业虽有上万年的历史，但在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社会文明以农耕为特色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主流生产和生活方式，农业不可能作为文化遗产来被关注。农业作为文化遗产受到关注始于社会经济和技术发生历史性转变之际——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现代农业取代传统农业的背景之下。

正因为如此，50多年前，当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创建农业历史专门研究机构时，将之命名为“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西北农学院将之命名为“古农学研究室”。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农业遗产的研究侧重于农业历史，尤其是古代农业文献的研究。农业历史与农业遗产在研究内容上有广泛的交集，但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历史是一个时间概念，其内涵更加宽泛，绝大多数农业遗产都属农业历史的研究对象，但许多农业历史的内容却谈不上是农业遗产。这是由遗产的性质和特征所决定的。

在遗产保护方面，人们最早关注的是自然遗产和有形文化遗产。20世纪末，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种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启动“全球重要农业遗产”项目（GIAHS）。

但FAO关于农业遗产的定义是为项目选择而设定的（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它要具有丰富的生物，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而实际上，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比这丰富得多。《世界遗产名录》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文化景观遗产”和“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5个类别。如果依据这个标准判断，农业遗产实际包含除单纯“自然遗产”外所有其他文化遗产门类。

农业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历史时期，与人类农事活动密切相关、有留存价值和意义的物质（tangible）与非物质（intangible）遗存的综合体系。它包括农业遗址、农业物种、农业工程、农业景观、农业聚落、农业工具、农业技术、农业文献、农业特产和农业民俗10个方面的文化遗产。

中国的农业遗产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大体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 1. 20世纪初至1954年

1920年，金陵大学建立农业图书部，1932年又创建农史研究室，在万国鼎先生的倡导下开始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农业遗产。他们历时十年，从浩如烟海的农业古籍资料中，搜集整理了3 7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分类辑成《中国农史资料》456册。

### 2. 1954年至1965年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4月，农业部在北京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不久，在国务院

农林办公室和农业部的支持下，在原金陵大学农业遗产整理工作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被任命为主任。与此同时，西北农学院成立古农学研究室，北京农学院、华南农学院也相继建立了研究机构，逐渐形成了以“东万（万国鼎）、西石（石声汉）、南梁（梁家勉）、北王（王毓瑚）”为代表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的4个基地。

### 3. 1966年至1977年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本时期农业遗产研究专门机构被撤并，研究工作大多陷于停顿。

### 4. 1978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科研工作逐步恢复正常。不仅“文化大革命”前建立的农业遗产研究机构陆续恢复，一些新的农史研究机构也陆续建立，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所、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史研究室、江西省农业考古研究中心，等等。1984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在郑州宣告成立，广东、河南、陕西、江苏等省还组建了省级农业史研究会。农业史专门研究刊物也陆续面世，如《中国农史》《农业考古》《古今农业》等。

在农业遗产专门人才培养方面，1981年，南京农学院、西北农学院、华南农学院、北京农业大学等被国务院批准有农业史硕士学位授予权，1986年，南京农业大学被批准有博士学位授予权，1992年，被授权为农业史博士后流动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农业经济管理学科设有农业史博士专业；华南农业大学在作物学专业设有农业史博士方向。具有农业史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还有：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等。

过去几十年，中国农业遗产的研究在工作重心上发生过几次重要的变化。

#### 1. 从致力于古农书校注和技术史研究向农业史综合研究和农业生态环境史研究转变

农业古籍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经过万国鼎、王毓瑚、石声汉等前辈们的艰辛努力，摸清了中国农业遗产的“家底”，相继整理出版了《中国农学史》（上）、《中国农学书录》《汜胜之书》《齐民要术校释》《四民月令辑释》《四时纂要校释》和《农桑经校注》等专著，为后来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遗产的研究重心出现了新的变化，逐渐由古农书的校注解读向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和农业生态环境史转变。本时期农业遗产研究有两项大的工程：（1）《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中国农业通史》（十卷，目前已出5卷）。

#### 2. 从单纯依托纸质历史文献研究向结合实物的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拓展

20世纪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遗址陆续发掘，随之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骨骼等农业遗存，农业遗产学者开始有意识的把考古发现运用到农业起源的研究中。

游修龄、李根蟠、陈文华等先生很早就注重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不少相关研究报告和论文，考古学者涉足农史研究者则更多。1978年，陈文华在江西省博物馆组织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后来又创办了《农业考古》杂志，对该学科方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3. 从单纯依赖历史文献研究方法向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特别是信息科技研究手段的变化

一方面，中国现存农业资料和历史文献浩如烟海，而且古籍在翻阅或利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损坏或丢失现象，不利于其本身的保护。另一方面，很多农业古籍被各家图书馆及科研单位视若

珍宝，一般不能借阅，其传播和查询、阅览也受到很多限制，影响了农业遗产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有鉴于此，近年来，国内农业遗产研究机构在将农遗资料与信息技术结合方面陆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2005年，在国家科技部专项资助下，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启动了中国农业古籍数字化的工作，并制作完成了一批中国农业古籍学术光盘，17种800多卷。2006—2008年，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又陆续建设了“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数据库”“中国近代农业数据库”“农史研究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农业遗产数据库，并创建了“中国农业遗产信息平台”。《中华大典·农业典》开始尝试开发和利用古籍电子资源进行编纂，相关数据库和应用软件基本研制成功；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也充分利用自己开发的各种数据库用于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清史·农业志·清代农业经济与科技资料长编》6卷的编纂工作。一些以农业遗产为主题的文化网站也相继创立，如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创办的“中华农业文明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创办的“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根蟠先生创办的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等等。

#### 4. 从原来静止不变的农业遗产资料的研究向活体、原生态农业遗产研究和保护的转变

活体、原生态农业也是农业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悠久的农业历史和灿烂的农业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经验，创造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区域特色并且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传统农业系统：如桑基鱼塘系统、果基鱼塘系统、稻作梯田系统、稻鱼共生系统、稻鸭共生系统、旱地农业灌溉系统、粮草互养系统，等等。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早在2000年，皖南乡村民居和四川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倡导下，尤其是中国科学院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积极推动下，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FAO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2010年，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和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也被列入试点。2011年6月10日，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成为中国第四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注重动静相宜、科普与科研相结合的各种农业博物馆也相继成立，中国的农业遗产研究开始走出象牙塔，迈向社会。

1983年，在农业部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博物馆建立，开始大规模征集与古代和近代农业相关的文物，并成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2004年，南京农业大学创办了中国高校第一个集教学、科研和科普为一体的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目前也是国家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览园建成，一共设有5个馆，其中就有农业历史博物馆。各地关于农具、茶叶、蚕桑等专题博物馆则多达几十家。

应该说，截至目前，除了古农书的整理与研究外，中国农业遗产的很多其他工作都仅仅是刚刚起步，例如，全国农业文化遗产的类型、数量、分布及保护情况，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理论、方法与途径等。哪些亟待保护？如何保护？如何实现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价值的平衡？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需要多学科的协作和多方面的共同努力。2010年和201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和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在南京陆续举办了两届“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论坛”，集合政府、学术界和遗产保护地多方面的经验和智慧，探讨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

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也是出于这些考虑，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决定继承原来编纂《中国农业遗产选集》的传统，启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丛书》，积极推进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工作的开展。

生态发展上，人们关注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社会发展上，人们关注社会多元化的重要性；但在人类发展上，我们却常常忽视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化的重要性。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保护文化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文化的基因。它既是文化认同的依据，也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因此，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

王思明

2007年11月18日

## 前言

2017年5月20~21日,首届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及南京农业大学共同主办;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新农村文化建设管理委员会、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协办;并由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日本东京大学、韩国釜山大学、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等60多家研究机构的150余位国内外代表参加了会议。

5月20日上午,大会举行开幕式。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教授主持开幕式。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张九汉、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周塞峰、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韩杰、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党委书记魏琦、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新农村文化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会长曹山明等出席开幕仪式。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丁艳锋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张九汉、魏琦发表讲话。

本次论坛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为主题,从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及建筑与规划学的视角,对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保护什么、如何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跨学科、多角度的剖析和探讨,并借鉴国外传统村落保护的经验和做法,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提供启示。

根据会议议题设置,讨论内容分为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记忆、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对策研究3个方面。

### 一、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记忆

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和灵魂,而村落则是传统农耕文化的载体。对传统村落资源进行挖掘、记录和梳理,既是留存村落记忆的重要途径,也是开展研究、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基础。因此,“传统村落文化记忆”这一议题愈发受到学界关注,也是本次会议中专家学者的讨论重点。

#### (一) 村落的形成与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潘劲在《村庄调研工作与体会》中,以北京远郊的红林村为研究对象,从宏观角度围绕农业、农村、农民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演变这一主线进行调研,从而达到对中国农村发展变化的映射。

长江师范学院王希辉在《散杂居蒙古族的社会变迁与文化适应——湖北鹤峰三家台村个案调查》中,以位于湖北省鹤峰县西北部的三家台蒙古族为调查对象,从生计方式转型的视角分析和探讨了散

杂居民族的社会变迁与文化适应问题。他认为，三家台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的后裔，经历了从宗族治理到村民自治的社会治理方式转变、从草原游牧到山地农耕的经济生活转换以及日常生活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转型与变迁。这种文化模式的变迁与适应，则是自然地理环境变化、多民族互动与长期混杂居住、历代中央政府政策引导、民族社会自身发展以及民族优秀文化智力支持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赵越云同样关注生计方式转变对村落变迁的影响，在《传统与现代：一个普米族村落的百年生计变迁史》中，分析了普米族村落在集体化前后生计模式的演变，认为传统与现代生计模式之间既存在继承关系，同时又相互割裂，因此，恰当处理继承优良传统与发挥现代优势的关系是未来农村何处去的基本走向。

防御性是中国传统村落规划和建设中的重要考量之一，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是学术关注的一个热点。皖西学院关传友在《皖西地区围庄村落的历史考察》中，通过对方志资料的挖掘与梳理，确定皖西现存的防御性围庄村落起源于南宋，清咸同年间达到鼎盛，其形成和发展是对生态环境的适应、遵从风水理论的原则以及宗族力量参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安庆师范大学王世红也以防御性村落为研究对象，在其《论皖南圩区的防御性聚落特质》论文中，对皖南圩区防御性聚落形成的原因、对外和对内的防御举措以及防御效果进行了深入分析。安徽财经大学周路在《黄河沿岸古村落研究——烽火台与古山寨》中，以烽火台与古山寨为切入点，探讨黄河沿岸村民们自发以家族和宗族为核心，在几近垂直的悬崖峭壁上开凿隐蔽山寨，以此躲避战乱，御防寇匪。

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潘慧生在《走西口与滹沱河上游商人村落形成——以忻州东南宋村为例》中，以东南宋村为调查对象，分析了清康熙年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滹沱河上游民众走口外与滹沱河上游商人村落形成的关系，认为因贫穷而走口外，走口外而经商，因经商而富裕，富裕而大兴土木、筑宅建院，是滹沱河上游地区诸多商人村落形成的原因。

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秦莹关注少数民族村落的建筑布局，在《阿昌族传统村落建筑布局实考》中，对“树洞里面藏身，大树枝桠当床”的阿昌族村寨进行实地考察，将阿昌族的建筑按其功能划分为提供家庭生活起居用的民居和水井、供奉神灵的宗教信仰建筑、进出村寨的寨门、象征村寨中心的寨心、供村民行走的路桥等，并对各类建筑进行详细记录。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郭建军重点研究晋北宏道镇的空间布局，他在《清末以来晋北宏道镇空间布局变迁》中，以1946年底宏道镇被解放为界限，将清末以来晋北宏道镇空间布局分为两大阶段，并从地形地势、宗族关系、宗教信仰、政治活动、社会运动、经济行为等方面分析原因。

### （二）文化遗产中的村落记忆

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曹天生在《人类非遗中国宣纸发源地泾县小岭村落保护构想》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的起源与发展为线索，对宣纸发源地小岭村的历史变迁进行细致梳理，并详细记录了小岭村的历史文化遗存。

广西师范大学产业经济与人才发展战略研究所乔柏认为，历史文化村落的存在价值主要来自历史遗存及其反映出来的一种精神文化，他在《中国传统古村落深层次精神文化挖掘——基于历史文化名村萝村古壁画的整理研究》中，对广西萝村现存的1033.85平方米古壁画进行系统梳理，总结了壁画所表达的精神文化内涵。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沈琳在《吴组缃的泾县古村落文化记忆》中,通过对现代皖籍作家吴组缃创作的涉及泾县古村落的文学作品进行解析,梳理泾县古村落文化记忆,包括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俗事象等。

民俗具有丰厚的地域历史内涵与地域文化特色,涉及工艺史、农业史、城市史、文学史、生活方式史、宗教史等诸多方面,是传统村落文化记忆的重要内容,也是村落研究的热点之一。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杨祺在《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流水席的重新建构及原因初探——以湖南连山大坪村为例》中,介绍了流水席的由来及其南北概念上的差异,并通过大坪村流水席模式及其变化,反思流水席城市化背后的乡村问题,认为流水席是一种村落文化和情怀,需要受到关注和保护。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卢勇、陈园园从少数民族婚俗着手,在《瑶族与壮族婚俗文化比较研究——以广西龙脊少数民族村寨为例》中,通过调研广西龙脊少数民族村寨,详细记录瑶族与壮族的婚俗礼仪,并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认为立法共存与价值观统一是瑶族与壮族婚俗文化的共性。

民间观念与信仰是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俗信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旭在《中原村落祭祀中火神造型的分异与荧惑信仰发微》中,通过研究道口、焦作部分村落保存的火神造型来源,探讨荧惑这一火神信仰的具体组成对火神造型的影响,认为中国古代民间的火神形象并非某个单一与火相关的神灵,而是包含荧惑、火德星君、祝融、阏伯、罗宣等多重形象在内的笼统神灵。

### (三) 传统村落中的历史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涛在《历史记忆与社会变革语境中的唐代江南乡村——以苏州甫里为例》中,从分析历史记忆与社会变革语境中的唐代江南经济入手,考察苏州甫里乡村经济的发展实态,进而对历史记忆与社会变革语境中的唐代江南经济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认为江南经济或东南经济成为国家财赋重心是以重赋来实现的,这样可能造成对唐代江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过高估计。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尹北直在《中国古代乡村文化记忆中的园篱伦理美》中,通过探讨乡村农户中普遍存在的“园篱”这一分隔、围合景观要素的制作技术和实用功能,分析“园篱”所承载的道德情操与审美意象,认为园篱所寄寓的亲近自然、诗意栖居的逸趣,勤勉务实的持家美德及柔而不犯的君子气度,体现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精神特质。

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包艳杰、张浩认为,唐宋时期中原的人居环境相对稳定,乡野景观高度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要素,达到了中国古代理想的景观状态,在《唐宋时期中原乡野景观的构成与表达》中,通过水土环境、土壤环境感知、景观等线索,复原唐宋时期的中原乡野景观,对乡村建设、景观设计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耕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一种独特的村落记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任在《传统村落视域下耕读文化发展初探——以黄陂大余湾为中心的考察》中,对根植于传统村落中的“耕读文化”进行了细致阐述,他认为耕读文化主要产生于乡村,由乡村里的读书人代代传承,村落和其中的读书人是耕读文化的载体。

南通大学文学院羌建、马万明将农史研究与传统村落研究相结合,在《清末民初大农业生产尝试

与传统村落的变迁——以江苏南通为例》中，将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农业观引入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探讨大农业生产方式对促进农村地区社会面貌改变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在当今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张謇的农业发展理念和措施对于理清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农村与城镇的关系，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自然衔接等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和经验参考意义。

## 二、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 （一）多视角下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中国化管理协会新农村文化建设管理委员会曹山明在《熟人社会是中国社会的根本》中，提出中国社会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天、地、心三者互生共存，在城镇周边的乡村恢复熟人社会形态是一种最佳的途径。他认为，应该用传统村落文化，建设现代熟人社会。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社会文化研究室龙文军在《历史文化村庄的价值与保护研究》中，通过梳理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基本情况，总结了传统村落原真性退化的原因主要包括：第一，居民保护观念淡薄；第二，自我管理和保护能力差；第三，政府投入保护资金有限；第四，传统文化继承人缺乏，并针对这些原因提出了相对应的保护政策建议。

衡阳师范学院城市与旅游学院杨立国在《传统村落保护度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湖南省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为例》中，运用理论分析、目标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原真度、活态度、完整度、价值度4个方面24个指标，构建了传统村落保护度评价指标体系和传统村落保护度综合评价函数。他还以湖南省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初步证明了该评价体系的实用性和计算函数的可行性。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郭鹏宇在《形态类型学在村落更新和保护中的方法论意义》中，从根植于村落日常生活的集群建筑类型切入，用上庄村形态类型演变解释形态学理论，澄清集群类型在村落形态结构演变过程中的意义。他认为，物质形态的变异也是乡村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环节，因此，村落更新应纳入整体形态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提出在村落保护具体的划区操作过程中，以集群类型所确定的形态时期片区可以作为村落保护的单元，不同单元采取不同保护措施。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沈费伟、范虹珏、肖泽干在《多元参与视角下民俗传承与乡村复兴——以湖州市荻港村为例》中，对东部发达地区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进行深入田野调查研究，以多元参与理论探析荻港村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乡村复兴之间的关系。认为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复兴需要多元力量的共同推动，具体包括政府政策扶持与资金供给、乡村精英挖掘与整理、社会组织弘扬民俗文化、普通民众本土文化的自觉以及市场旅游业促进民俗文化得到充分展示等。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吴昊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霍晓丽合著的《文化产业视域下中国传统村落记忆——以湘西捞车古村寨为例》中以湘西捞车古村寨为个案，基于村寨的民族文化遗产资源，从发展方式和人文关怀两方面探索民族文化遗产资源运用于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以期对武陵民族地区乃至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借鉴，并且尝试探索我国民族地区旅游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途径。

南京农业大学詹国辉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传统村落的共生性发展研究——基于江苏S县的调研数据》中，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理顺了传统村落共生性发展过程中的相关利益主体，有效辨识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基于生态学意义上的共生理论，搭建出传统村落共生发展系统，厘清了其共生格局及其具体形态。他还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建构出传统村落的共生度模型，进而基于江苏省S县的调研数据，测度出5个典型村落的共生度。他认为，通过提高共生单元的质参量，完善共生界面，促成共生新增能量的产生等路径，可以实现传统村落的共生性发展。

铜陵学院思政部崔磊的研究关注如何让乡村精英回归来实现传统村落文化的建构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他在《乡村文化精英与传统村落文化记忆建构》论文中，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陈述：乡村文化精英与传统村落文化记忆建构的可行性、面对的困境以及两者间的协调性。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王佳星在《用文化元素丰富美丽乡村内涵——以浙江省平湖市鱼圻塘村为例》中，以浙江省平湖市鱼圻塘村为例，认为在鱼圻塘村建设美丽乡村的实践中，可以从打造宜居乡村、挖掘历史遗产、扶植当代乡风、培育文化生活4个方面入手，并总结实践中获得的启示：（1）合理规划，找准亮点；（2）发扬传统，形成特色；（3）转换视角，激发认同。

## （二）国际传统村落保护经验借鉴

传统村落保护是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下的命题，国外的工业革命早于我国，因此，传统村落保护的历史比我国长久，相关的历史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学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建军在《英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核心理念及其实现机制》中，介绍了英国传统村落保护的理念，并总结了英国传统村落保护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他认为，良好的传统村落保护管理取决于相关的政策和保护行动对传统村落存在的“普遍价值的理解”，有关乡村景观和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共识是传统村落保护成功的关键所在，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之间的协同行动，是传统村落保护理念和愿景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

韩国釜山大学历史系崔德卿介绍了韩国传统民俗保护的工作经验，在《韩国传统民俗maeul的保存原则和实际》中，总结了韩国民俗村落的价值和保存方向，他认为19世纪70~80年代以后，韩国政府主导复原民俗文化体验，政府与居民之间产生了矛盾，而通过创造条件让居民自治、开展符合条件的收益事业，可以使民俗村落持续健康地恢复。

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林茂在*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uzhen and China's Soft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中，重点研究乌镇的发展模式，探讨乌镇从传统“鱼米之乡”到当代“智慧小镇”的嬗变，并揭示了乌镇的国内印象与国际印象之间的差异。

## 三、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对策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传统村落保护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传统村落保护同样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保护对策以及探索适合的利用模式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主要内容。

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王景新在《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与持续发展调研报告》